
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

麥笛 (Dirk Meyer)

英國牛津大學皇后學院

陳子如譯

這篇論文提供了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篇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 Geertz 1973)。「深描」通過探索〈湯在啻門〉的交際維度，並分析文本與施行之間的互動，在時間話語中重構〈湯在啻門〉的交際使用。該篇文本記錄了想像中的成湯帝和名臣伊尹（始終被介紹為「小臣」）在啻門的一次對話。該文本是高度格式化的，呈現了一次關於「古之良言至於今」的交談。對話由兩部分構架而成：一是在《書》的文本傳統中習見的慣用引言；一是從

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

* 筆者要感謝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 Andrew Meyer 充滿洞見的評論和建議，對這篇論文的改善有極大的幫助。

「戲劇性」角度（Utzschneider）出發，對文本的總結評價。討論事項以目錄的形式出現，同時文本是押韻的，暗示了文本的完整性。然而看似貧乏的內容卻與勻稱的結構相矛盾，出現了古怪的空話，令現代讀者困惑不已。通過利用內容—形式理論和信息論，及考慮其表演性維度，本文探究了內容和形式之間的明顯衝突，並重構了戰國時期社群通過格式化文本闡明意義的策略。被放入這樣的脈絡後，作為戰國時期（約公元前 453– 前 222）思想景觀中演出文本之意義建構的參照物，這篇相當古怪的文本起到了更全面的作用。

一、文本與簡書

〈湯在啻門〉是篇相對較短的文本，由八個不同的模塊構成，共包含七個思想單元，可分為哲學核心和其應用兩部分。它被寫在 21 枚 44.5 厘米長的竹簡上，收錄在清華簡中。¹

在簡片的頂部、底部和中間由三道繩索編連。有些簡片的尾部有兩個平行標記。按簡片背面的標記所示，前二十片來自同一個竹筒；只有 21 號簡片來自不同的竹筒。² 這裡使用的順序，是清華簡整理組基於文本中事件順序作的排序，簡片的背面並沒有序號。

11 號和 20 號簡片的上端已折斷；7 號簡片缺少尾部。不過似乎沒有文字缺失。若干字是模糊的（比如 40 號簡片中的相或地）。

平均每簡有 28 個字。簡文的書法大體一

1 竹簡的照片（141–148）發表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4–17、71–84；頁 141–48 附帶注解。

2 Lǐ Shǒukuí 李守奎，“‘Tāng zài Chì/Dì mén’ dǎodú” 湯在啻門導讀 (paper presented at “Human Nature, Morality, and Fate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Bamboo Manuscripts, Tang chu yu Tang qiu 湯處於湯丘, Tang zai Chi men 湯在啻門, and Yin Gaozong wen yu san shou 殷高宗問于三壽”,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Erlangen, May 12, 2016).



圖 1

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

致，僅有少數例外。據李守奎所言，簡文偶現楚國文字，而大部分書法表現出明顯的三晉特徵。³ 簡文有二次修改的痕跡，抄寫者在已有書寫中加入了更多的字，表明了對文本完整性的關注。例如 6 號簡片上的好字；7 號簡片上的乃字；20 號簡片上的唯字。（可見圖 1，從右至左分別為 6 號簡、7 號簡、20 號簡）。簡本無標題，現有標題由清華簡整理組擬定。

簡文有斷句標記，或稱「換氣」標記。它們持續用於感歎或問題中，在表述核心概念時亦被反覆使用。

簡文的精心製作與文本內容在純粹的詞彙意義層面上存在明顯的矛盾，後者偶爾會出現相當的不足。二次修改和換氣標記表明，這篇簡文不僅是為了展示，更是為了使用、也就是被大聲朗讀出來而製作的。⁴ 文本的某些特徵表明它十分適合這一目的：文本大部分是押韻的，而且句子往往被精心平衡處理，故保持著嚴格的平行格式，帶來一定的流暢韻律。由於其形式呈現受到了如此重視，它在詞彙層面上的內容就顯得尤為貧乏。從表面上看，該文本包含很多老生常談的表達和可預測的反問，而且它有許多缺乏詞彙解釋的數字，這些數字奇怪地脫離了前文的思路，讓現代讀者相當困惑。

3 同上注。

4 關於早期中國代表性文本的討論，見 Matthias L. Richter, “Textual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Literac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eds.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206–36。

二、格式化的意義

我們應該如何閱讀〈湯在啻門〉？這篇相當古怪的文本，約在兩千五百年前為一個意義共同體（meaning community）創作，我們必須假設，這個共同體與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幾乎沒有共同點。這篇文本的太多措辭看上去都是奇怪的陳詞濫調且毫無意義，它明顯不是與我們對話的作品，那麼我們如何能從其中發掘意義？誰是能理解這個文本的群體，他們是如何使用它的？它究竟有沒有意義？如有，那它產生意義的策略是甚麼，而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解開這些策略？

（一）闡明閱讀策略

〈湯在啻門〉的古怪特點清楚表明，用傳統的窮盡式研究路徑來解讀文本，比如選出關鍵術語並在戰國時期的思想語境中討論它們，將不會得到甚麼結果。不幸的是，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中國哲學研究所採用的普遍方法。文本相當確切地違抗了這樣的理解策略，而且使用這種策略的唯一結果將是，我們斷定它是糟糕的文本，它完全無法產生意義，亦說明不了任何東西。很顯然，古代的共同體不會以這樣的方式使用它。考慮到其押韻和語句平衡的文本特徵，古人使用這一文本時的首要關切不太可能僅僅停留在其語彙層面。我們必須假定他們使用的是它的表演性維度。⁵

5 「表演性維度」的概念相當廣泛，可能包括文本的表演性根源。筆者將於結語討論戰國時期是否存在審美私讀。

這應該告訴了我們讀解文本的策略。通過給予〈湯在啻門〉一種寬容的理解，並假定它自身具有意義⁶，我將揭示它生產意義的策略，並重構它在古代的使用方式。我提議，分兩步分析其論證的文學形式：首先，探索其在微觀層面，即通過單一構件建構意義的方式；其次，將其在微觀層面建構意義的策略應用到整個文本中，即宏觀層面的分析。⁷

這樣的分析將表明，〈湯在啻門〉的意義主要不是在意指的水平層面上發展的，即單純的詞彙，而是首先通過

-
- 6 寬容的理解是所有成功交流的基礎。它要求把一個說話者的陳述（或者一個文本）解釋成正確的，也要求考慮一個論點最佳和最有利的可能理解。見 Normand Baillargeon, *A Short Course in Intellectual Self-Defense*, trans. Andréa Schmidt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7), 78。
- 7 筆者已經在不同的文本如《忠信之道》、《窮達以時》、《五行》上測試過這種策略，它們都是戰國時期的文本，以及《秋水》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見 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Meyer, “The Art of Narrative and the Rhetoric of Persuasion in the ‘*Jin Teng’ (Metal Bound Casket) from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68, no. 4 (2014): 937–68；Meyer, “Truth Claim with no Claim to Truth: Tex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Qiushui’ Chapter of the Zhuangzi”, 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eds. Joachim Gentz and Dirk Meyer (Leiden: Brill 2015), 297–340；Meyer “‘Shu’ 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 A Re-evaluation of ‘Jin teng’ and ‘Zhou Wuwang you ji’”,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 eds.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 (Leiden: Brill 2017), 224–48。

對美學的訴求來闡明。這是由韻律、格律和有規律的語句平衡實現的。文本產生了一個有哲學意義的啟示，它呼籲讀者具有感受美的能力，並能將美看作宇宙格式無所不在的證據，包括物質宇宙組織及人造文明。通過在文本構成層面重現這些格式，〈湯在啻門〉成為了它們的延伸。它從而彌合了物質宇宙和被建構的人類文明之間的差距。由此可見，朗誦文本成為了具有哲學意義的行為，傾聽者活躍地參與其中，並通過參與行為維持這些結構。

（二）單元一

單元一是〈湯在啻門〉大部分內容的範例：其特徵是引人入勝的聲音織體和精巧的創作結構，同時還包括朗讀標記或稱「換氣」標記的規律性使用。⁸這和它在水平層面，即純粹詞彙層面上相當貧乏的意義建構奇怪地並置在了一起。

〈湯在啻門〉的開篇是「書」類傳統文本中的常見框架

8 由管錫華在 2002 年所主張，他尤其關注傳播中的文學，關於早期中國書寫中的標點已有很多討論。廖名春 2000 年指出了在手寫文本的文本分隔的問題上記號的重要性。李孟濤（Richter）專注於原稿，將以前未被發現的體系化納入了中國書寫中的標點研究。對中國文本中的標點的一般性討論見於何莫邪（Harbsmeier）1998；傅熊（Führer）和畢鶚（Behr）2005；Nikita Bichurin（1999–1853）是第一個討論中文標點的人（引自 Imre Galambos 高奕睿，“Punctuation Marks in Medieval Chinese Manuscripts”，in *Manuscript Cultures: Mapping the Field*, eds. Jörg B. Quenzer, Dmitry Bondarev and JanUlrich Sobisch (Berlin: De Gruyter, 2014), 342–57）。高奕睿在 2014 年討論了中古中文簡書中的標點符號。

(frame)，即一種戰國時期由多種群體使用的語體風格。這種風格是出於社會政治和哲學的目的，在當下重建過去的嘗試。在他們的自我呈現模式中，這些文本以過去聲音的姿態 (Gestus) 存在於當下，並且和未來相關。⁹ 這一框架進一步通過具體紀錄成湯（約公元前 1675– 前 1646，即商朝的開國之君，在安陽甲骨文中被記載為大乙）和他的一位顧問（即文本中所稱的「小臣」）之間的問答來作為文本的開場白。這從而將〈湯在啻門〉和一個獨特傳統關聯起來，使其被置入社會政治和哲學的辯論之中。在定位事件發生的時間和空間時，它採取了一個觀察周到的編年記事者的姿態，¹⁰ 呈現出如同舞台表演的「戲劇性」開場，使〈湯在啻門〉十分適合口頭表演。¹¹ 單元一與「書」類傳

9 關於戰國時期「書」的傳統和它們充滿活力的社會政治和哲學維度，見 Dirk Meyer, *Traditions of Writings 書 (Shu)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10 關於利用特定框架結構將特定文本與「書」類傳統聯繫起來，見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The Textualiz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Dirk Meyer,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Memory Production: Debates on Rulership as Reconstructed from ‘Gu ming’ 顧命”,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eds. Kern and Meyer, 106–45。

11 關於早期文學的「戲劇性」特徵，見 Helmut Utzschneider, “Ist das Drama eine universale Gattung? Erwägungen zu den ‘dramatischen’ Texten in der alt. Prophetie, der attischen Tragödie und im ägyptischen Kultspiel”, in his *Gottes Vor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r literarischen Ästhetik und ästhetischen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Stuttgart: Kohlhammer, 2007), 269–90。關於柯馬丁 (Martin Kern) 2009 年對《尚書》作為正式的朗誦文本的討論 (Martin Kern, “Bronze

統的框架相連，在知識上統攝了《湯在啻門》的對話：

1.

|¹ 貞(正)月己咳(亥)，湯才(在)啻(帝)門，
問於少(小)臣：

「古之先帝亦有良言(*raŋ-¹ŋan)青(情：
[dz]eŋ)至於今([k]r[ə]m)虎(乎)?」

少(小)臣畬(答)|²曰：

「又(有*G^wəʔ)才(哉*ts^ʔə) ■。」

女(如)亡(無)又(有)良言(*raŋ-¹ŋan)

清(情：*[dz]eŋ)至於今(*[k]r[ə]m)，

則可(何) ■ 以成^人(*deŋ-¹niŋ)?

可(何)以 成^邦(*deŋ-¹p^ʔroŋ) ■ ?

可(何)以 成^地(*deŋ-¹ʔej-s) ■ ?

可(何)以 成 |³ 天(*deŋ-¹ʔin)

■ ?」

Inscriptions, the *Shijing* and the *Shangshu*: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estral Sacrific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t. 1, Shang through Han [1250 BC–220 AD]*, eds.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Leiden: Brill, 2009], 143–200), Yegor Grebnev 深化了 Utzschneider 「戲劇性」的概念，並把它應用在早期中國文本，尤其是「書」的傳統中的演說內容，見 Yegor Grebnev, “The Core Chapters of the *Yi Zhou shu*”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戲劇性演說的標準包括「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呼語詞和感歎詞在文本中的分布」。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將類似舞臺表演的演說框架看作戲劇性文本的另一個重要特徵。

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的深描及其對中國早期思想生產的啟示

在純粹的水平層面，即意指的語彙層面上，這一構架作用不大。成湯詢問小臣「古之先帝」的教導的本質，以及它是否對當下有所啟示。小臣作出了肯定回答，並以反問句回應關於具體事情的狀況。對我們來說，小臣以反問作出的回答顯得相當陳詞濫調，但事情並非看起來的那樣簡單。

小臣列舉出了有關社會領域的事項——成人和成邦，與之對應的是宇宙秩序中的成地和成天。正如在〈湯在甯門〉中更為普遍的情況那樣，這個單元在詞彙層面上只提供了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無論是提問者還是回答者——但它把它們編織進了一個引人入勝的聲音織體中，與具有嚴格規律性的語句格式成對。我用黃色和綠色標出了成對的諧音，用方框圈出了不和諧音。

文本以成湯的問題開頭，以語音網絡構成，把相關事項組織成有意義的單元。比如，如果忽視語音結構的話，就很難僅從語法上分析成湯帝的問題¹²，而且人們可能傾向於把「良言情」理解成「好的語句和情感」。然而，如果通過語音結構理解，就容易看到它們實際上明顯是兩對詞：良言（*raŋ-*ŋan）「天然有益的教導」必須構成一個單元，情今（*[dz]eŋ-*[k]r[ə]m）「[它們]（在我們）今天的實際情況 / 實質」構成另一個——由聲音織體組成。¹³

12 「古之先帝亦有良言情至於今乎」。

13 雖然後一對詞可能沒呈現出良好的韻律——所以筆者說的是〈湯在甯門〉的語音織體——單元一和單元二之間相關主要元音的劃分清楚表明它們是兩個獨立但相關的組。因此，文本說的是「良言」（*-aŋ）和「情今」（*-e/ə）。

在揭示了該單元如何超越水平層面，即在純粹詞彙層面之外產生意義的方法後，其剩餘部分以相同的方式繼續，因為小臣的回答也是由聲音織體構架的，以一個簡短的兩音節肯定回答（有 *G^wəʔ 哉 *ts^ʰə「的確有 [這樣的教導]」）作為顯著框架。

接下來的就十分有趣了：人們認為會出現押韻的事項——成就社會領域和宇宙領域的目錄——沒有使用原本會成為本單元特點的引人入勝的聲音織體。「成人、成邦、成天、成地」以粗拙的語音結構出現，每個詞都有一個不同的主要元音，它們的開頭和結尾有各種不同的發音位置。¹⁴ 目錄正是通過有意營造這種看似不合常規的聲音特徵吸引觀眾的注意。而它的引人入勝是由平行詞組的緊湊結構造成的。

但目錄與流暢語音織體粗暴的決裂不僅是為了吸引聽眾的注意。它也強化了所說之言的意義。正如上面的語音對子一樣，¹⁵ 這個單元通過塑造古代良言——它們以悅耳的聲音織體為特徵——和它們今天的實際情況之間的二元性來確立意義，聲音近似有形的樸拙特徵造就了它們在本體論層面上難以駕馭的表象。

儘管語音是笨重的，它們還是呈現出清晰的規律性和

- 14 則 可(何)()以成人(*den-ⁿniŋ) ?
 可(何) 以成邦(*den-^proŋ) () ?
 可(何) 以成地(*den-^lej-s) () ?
 可(何) 以成天(*den-^ʃiŋ) () ?

- 15 兩對詞「天然有益的教導」和它們對當下的影響。

美麗的平行性。它們的有形存在雖然難以駕馭，但被證明是和諧的。

對這個單元的分析顯示，任何通過抽取詞彙的意義，從而在水平意指層面上理解它的嘗試都注定要失敗。這種方法讓成湯帝和小臣所說的話看起來陳腐而平庸，並且沒有意義。顯然，詞彙是第二位的。更確切地說，這個單元首先通過聲音和結構產生意義。小臣的回答在水平的意指層面上是陳腐的，卻又顯示出並不是空洞的，而是修辭層面的抽象，其意義主要由文本構成的形式方面體現。

（三）單元二

許多戰國時期基於論證的文本（*argument-based texts*）在它們的第一個單元中都發展出了由整篇文本所支持的基礎論證模式。¹⁶ 對評注者來說，這意味著通過解開文本開頭中闡明意義的策略，便可以得到正確閱讀文本之方法的關鍵。這也適用於〈湯在啻門〉。也許我們還沒弄清楚它到底說了甚麼，但我們已經知道了它是如何運作的。

單元二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延續了成湯帝和他的建議者之間的談話。成湯帝提出一個問題，小臣以格式化的演說回答。

16 關於基於論述文本的製造意義的策略，見 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2.

湯或（又）問於少（小）臣曰：

「幾言成_人 [] ? (*deŋ-^{*}niŋ)

幾言成_邦 [] ? (*deŋ-^{*}p^ʃroŋ)

幾言成_地 [] ? (*deŋ-^{*}l^ʃej-s)

幾言成_天 [] ? 」 (*deŋ-^{*}l^ʃej-s)

少（小）臣畬（答）曰 |⁴【3】：

「_五以成人，惠（_德）以光之 [] ；

(*k^{wʃ} aŋ)

_四以成 [] 邦，_五以相之 [] ； (*[s]

aŋ-s)

_九以成地，_五以將之 [] ； (*[ts]aŋ-s)

_九以成天，_六|⁵以行之 [] 。 」(*[g]

^ʃraŋ-s)

最令現代讀者感到驚訝的是，成湯帝沒有尋求教導的內容，而是直接詢問了它們的數量。雖然這對我們來說難以理解，細緻分析以下單元就能發現，成湯帝這樣的做法表明他已理解了——即使是含蓄地——這些教導和它們的含義。這正是另一個證實被這一時期許多文本所支持的關於修身的普遍但自相矛盾的觀點的例子，即只有已經具備美德的人才能進一步滋養他們的美德。¹⁷

17 關於中國話語中自我培養的矛盾，見倪德衛在 David S. Nivison,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icago: Open Court, 1996), 33ff 中對「美德困境」的論述。

小臣的回答結構古怪，由圍繞數字四、五和九的規範表述組成，又加上「德」和數字六。但其後有一個清晰的體系：五標誌著人的領域（成人），四標誌著社會政治的領域（成邦）。它們一起形成了宇宙的九。不過，「成人」需要有足以使其與眾不同的美德。這產生了六，即「成天」所需要的數字。在沒有清楚說明的情況下，小臣繼續闡述人和宇宙是如何相互交織、彼此不可或缺的，進而說明只有賢人、有德之人才有可能在人的領域內實現天意。這樣說來，論點的形式和內容構成了單一的實體，其中它們相互體現著彼此。在小臣所作的規範表述中，它們不能被分開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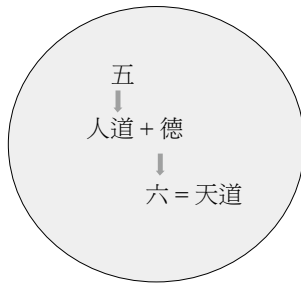


圖 2 人與宇宙的交織

但表現世界對稱性的不僅是數字。小臣對成湯帝的回答中，一方面是難以駕馭但勻稱的物質實在性，另一方面是教導的悅耳流動，二者之間的原型二元性也由「光」、「相」、「將」、「行」四字確認，這四個完美的押韻字描述了平衡體系中良言的核心。簡文中沒有一處明確這樣說，但顯然這四個字代表著成湯帝所尋求的古代教導的核心，

它們將人和宇宙交織在一起。當我們把〈湯在啻門〉隱含的意義建構的普遍原則應用到這個單元時，就會知道這一點，因為這四個字是押韻的。

通過製造一個由數字四、五、九，以及德和六所組成的世界，並且在其中心社會和宇宙取得平衡，這個單元從而顯示了而非解釋光、相、將、行這些必需的要素，清晰地展示了古代教導，形成了文本的哲學核心。簡文的剩餘部分（三到七單元）逐一詳細闡述了這些關係的本質，表明了對人的五和有美德的睿智的規範表述背後的本體論現實；「五以成人，德以光之；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九以成地，五以將之；九以成天，六以行之。」。這樣，〈湯在啻門〉不僅表明了數字的重要性，還通過探索它們的實際對應物，展示了成湯帝對這個由教導彌合的平衡世界有傾向的、直覺的理解，因為他首先問的是關於數字的問題。

最後，這個單元也重現了德是人類活動的關鍵的觀點，這個觀點之前是由成對的詞語闡明的，現在必須同時在水平和垂直層面上理解：德和六（即人的五加上德）構造了這個陳述並因此囊括了人的五；五反過來是由社會的四加上德產生的，影響了宇宙的九。見下面的模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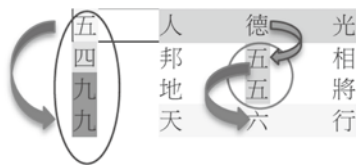


圖 3

(四) 單元三

至此，顯現出高度平衡性和對稱性的論述形式是古代教導所投射的、小臣所描繪的世界的模仿。文本已經在它的核心本質中建立了宇宙平衡體系，它的剩餘部分繼續詳細描述了數字背後的内容，這些數字關聯了人和宇宙，將之嵌入世界這個平衡體系，它結合了人和社會（也就是邦）、地和天，以及人和宇宙。與當時以論證為基礎的文本並無不同，該文本也由哲學核心和其應用兩部分構成，而此刻文本出現一個明顯的轉變，即開始論述上述規範表述背後的現實。文本以探索人的五開始，隨後是社會的四和宇宙的九，最後是賢明的六。

3.

湯或（又）問於少（小）臣曰：

「人可（何）得（德？）以生（*sreŋ）

■？

可（何）多 以長（*sreŋ）？

孰（*duk）少（小）（*s.tew？）而老
（*C-r^hu？）■？

胡（*g^ha）猷（猷）是人（*niŋ）■，

而⁶罷（一）亞（惡）（*ŋ^hrak-s）

罷（一）好？（*q^hu？）」

少（小）臣畬（答）曰：

「唯皮（彼）五味之炁（氣）， 是哉以為人。

斤（其）末炁（氣）， 是胃（謂）玉

(*ŋok) 種 (種) (k.təŋʔ):

𠄎 (一) 月𠄎 (始) |⁷ 揚 (孕),¹⁸

二月乃裹,

三月乃刑 (形) [redacted],

四月乃胡 (固) [redacted],

五月或 (又) 收 (衰),¹⁹

六月生肉, 七月乃肌 [redacted],

八月乃正 |⁸,

九月𠄎 (顯 / 解 / 解) 章 [redacted],²⁰

十月乃成 (*m-[d]eŋ) [redacted], 民乃時生 (*sreŋ) [redacted]。

𠄎 (其) 𠄎 (氣) 𠄎 (潛) 𠄎 (獸) 發𠄎 (治) [redacted], 是𠄎 (其) 為長 (*traŋʔ) 𠄎 (且) 好才 (哉) [redacted]。

𠄎 (其) 𠄎 (氣) 𠄎 (奮) |⁹ 昌, 是𠄎 (其) 為堂 (當) (*tʰaŋ -s) 𠄎 (壯) (*[ts]<r>aŋ -s)。

𠄎 (氣) 融交以備, 是𠄎 (其) 為力 [redacted]。

𠄎 (氣) 𠄎 (蹙) 乃老, 𠄎 (氣) 徐乃猷, 𠄎 (氣) 逆亂以方 |¹⁰【9】, 是𠄎 (其) 為疾央 (殃)。

18 一些評論家會讀作「揚 (孕)」。

19 一些評論家會讀作「收 (衰)」。

20 一些評論家會讀作「解 (解)」。

炁（氣）屈乃冬（終），百志皆窮
（窮）。

正如成湯帝在單元二對數字的突然詢問雖然看上去古怪地脫離了對話的流動，但真正顯示出了他對事情預先培養良好、直覺性的理解一樣，這個單元使用了一個相似、但在結構上相反的策略來表明成湯帝對事情的把握。既然數字被證明是教導的關鍵，那麼成湯帝所詢問的其實是人的範疇，而不是與人有關的數字五代表著甚麼。然而，他提出問題的方式說明他已理解了這些問題，因為他在問生、長、老、好、惡這五個核心要素。這反映在他的問題構成的方式上，其中一張押韻的網建構了人的各要素之間的關聯性，表明它們實際上是同一週期的不同階段。小臣的回答同樣以各要素的順序展開——他稱其為人的五味之氣，這與他之前的話相互參照，表明成湯帝已經理解了——並再一次以押韻和平行的句子格式為特徵。

他的回答遵從了嚴格的平行格式，用十個朔望月歷數了人誕生的周期。它以押韻作結，為表示出生周期的完成適用於整個民族：

十月乃成（*m-[d]eŋ），民乃時生
（*sreŋ）。


韻律繼續佔據支配地位，表達了人的發展隨著世界和諧地流動，且從不會與之產生衝突。

（五）單元四 A 部分

在人的事情以其五個核心要素被闡明後，單元四繼續詳細闡述了單元二關於國邦的四個核心要素，以及治理其所必需的五個要素。它把國家的核心要素稱作「四正」，僅把它們指為治理國邦所必需的五個要素的目錄的一部分。顯然，第五個要素同樣也是助人成聖的：德。


4A.

湯或（又）問於少（小）臣：

「夫四以成邦，五以相之¹¹，可（何）（*g^ʔaj）也（*lajʔ）？」

少（小）臣畬曰：

「唯皮（彼）四神（*Cə.li[n]），是胃（謂）四正（*Cə.li[n]）；

五以相之：惠（德）、事、役、正（政）、型（刑）。」

（六）單元四 B 部分

這個單元最好被認為和單元四 A 部分有套娃式的關係，因為它探索了和治理邦國有關的五個核心要素背後的內容：德、事、役、正（政）、型（刑），每個要素都以嚴格平行的二元對立目錄呈現。這是文本中最長的一個條目，而且給出了最具體的標準。通過呈現好和壞的二元對立，它連接了單元三的主題，其中人的問題得以發展。簡文中，單元四 B 部分中的每個陳述都有換氣標記，用以強調：

4B.

湯或（又）問於¹²少（小）臣：

「嫩（美）惠（德）奚若？ 亞（惡）惠
（德）奚若[■]？」

微（美）事奚若？ 亞（惡）事
奚若[■]？」

微（美）役奚若？ 亞（惡）役
奚若[■]？」

微（美）¹³正（政）奚若？ 亞（惡）正
（政）奚若[■]？」

微（美）型（刑）奚若？ 亞（惡）型
（刑）奚若[■]？」

少（小）臣畬（答）[■]：

「惠（德）濬明執信以義成，此胃（謂）¹⁴
微（美）惠（德），可以保成；


惠（德）變亟，執譎以亡成，此胃（謂）
亞（惡）惠（德），唯（雖）成或（又）渝[■]。

起事又（有）穫，民長¹⁵萬（賴）之，此
胃（謂）微（美）事[■]；


起事亡（無）穫，病民亡（無）古（故），此
胃（謂）亞（惡）事[■]。

起役時訓（順），民備不備，此
胃（謂）¹⁶微（美）役[■]；

起役不時，大彌（費）於邦，此


胃（謂）亞（惡）役 。

正（政）東（簡）以成， 此


胃（謂）微（美）正（政） ；

正（政）怵（華）亂以亡（無）常，民 |¹⁷ 咸


解（懈）體自卹，

此胃（謂）亞（惡）正（政） 。

型（刑）情以不方， 此

胃（謂）微（美）型（型） ；

型（刑）泰以亡常， 此

胃（謂）亞（惡）型（刑） 。」

（七）單元五

在探索二單元的規範表述的過程中，單元五和六——它們探索了宇宙的九——和單元四（A 和 B 部分）在結構上是平行的。所有這些對子裡的第一個數字（單元四 A 部分中的四；單元五和單元六中的九）都是以抽象的押韻定義呈現的，而只有後面的數字在目錄中解釋得較為清楚。儘管如此，我們仍有可能了解這些未詳述的數字的內容。在單元四 A 部分中，前面的數字更小，因此被完全包含在目錄中。文本因此似乎暗示了「成（建立 / 征服？）邦」和「相之」相比是更小的成就；而隨著加上德，也就是使一個有成就的人成為聖人的品質（單元二），目錄變得完整。在單元五和六中，押韻對裡的前一個數字更大，因此沒有在接下來的目錄中被明確闡述——但我們從上文得知它包含人的五和社會的四。成湯帝的詢問一直是押韻的。

5.

湯或（又）¹⁸問於少（小）臣：

「九以成地，五以將之，可（何）(*g^ʰaj)也
(*1aj?) ？」

少（小）臣畬（答）曰：

「唯皮（彼）九神(*Cə.li[n])，是胃（謂）
地真(*ti[n])，

五以將之¹⁹：水、火、金、木、土，以成五
匚（曲），以植五穀。」

6.

湯或（又）問於少（小）臣：

「夫九以成天，六以行之，可（何）(*g^ʰaj)
也(*1aj?) ？」

少（小）²⁰臣畬（答）曰：

「唯皮（彼）九神(*Cə.li[n])，是胃（謂）
九宏(*[g]^{wʰ}<r>əŋ)，[真 and 耕 *rhyme contacts*]

六以行之：晝、夜、菴（春）、夏、秋、
冬，各時不解，此佳（惟）事首，亦²¹佳
（惟）天道。」

（八）單元六

除了和與上天的宇宙的九有關的核心術語外，單元六是單元五的重複。

「唯彼九神，是謂九宏」這個短語不完全是直接押韻

的，因為神（*Cə.lin 真韻部）和宏（*[g]wŋ<r>əŋ 耕韻部）沒有相同的主元音，而主元音通常是押韻的關鍵標誌。然而，考慮到它和上一個單元完全平行的建構，我們必須假定，對我們所討論的共同體來說，這已經足夠適合押韻了。就我們可以相信古漢語重構系統而言，²¹ 在早期中國文獻中有充足的押韻對句沒有相同主元音的例子；²² 而且真韻部和宏韻部之間也有明顯的押韻聯繫，我們所討論的詞就屬於這些韻部。²³ 這足以支持我的假設，即對於被討論的共同體來說，這些詞至少是交叉押韻的。

在單元二的四個規範表述中，亦即組織起〈湯在啻門〉全部內容的哲學核心中，德被證明是關鍵品質，是人（即個體）和社會（即國邦）之間的粘合劑，也是使人和宇宙能夠囊括彼此的元素。它是天和人、地和社會的結構化世界背後的原則。單元六的目錄現在把日夜和春夏秋冬作為不解之結列舉了出來，說明文本主張有德之人按照世界的自然格局生活。

21 筆者用的是白一平（Baxter）和沙加爾（Sagart）2014年最後修改過的系統。然而，參見何莫邪在2016年提出的重要問題。

22 康森傑（Tharsen）給出了一下例子：在《詩經·小雅》的《節南山》中，領（*reŋʔ）和騁（*lreŋʔ）組成了一個押韻對；在《小宛》中，令（*riŋ/*riŋ-s）和鳴（*m.reŋ）、徵（*teŋ）和生（*sreŋ）押韻。見“Chinese Euphonics: Phonetic Patterns, Phonorhetoric and Literary Artistry in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ext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120。

23 大孟鼎銘文的押韻例子，見康森傑的討論（同上注）。

（九）單元七

單元七以標誌著終結的成湯帝的最後評論構成了〈湯在啻門〉的結尾。正是在這裡，文本公開了小臣的身份是伊尹（傳統認為供職於公元前 1600– 前 1549 年），他幫助成湯帝推翻了夏朝，並鞏固了商朝的統治，據說曾撰寫《尚書》中的《伊訓》一文來勸誡成湯帝的繼任者太甲：

7.

湯曰：

「天尹，唯古之先帝之良言，則可（何）以改之！」

簡文直到結尾還把中國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叫做「小臣」不是出於疏忽。對同時代的接受者來說，「小臣」身份意料之外的揭示必然是個衝擊，是一種突然的領悟，其效果因此類似於成湯帝最後意識到他已經獲得了金科玉律。在早期中國的論述架構中，促成文本接受者的領悟時刻與文本主人公的領悟時刻平行的策略並不鮮見。²⁴ 它顯示了接受者的文本參與，並強調了文本的演出性質。在〈湯在啻門〉中，它還表示實現了的期望。正是通過成湯帝對教導的接受，伊尹才從「小臣」變成了為世人所記住

24 例如在《周武王有疾》中，周成王在從金縢中取出占卜記錄的一刻才意識到他對周公的不公，這個時刻也為文本接受者不斷重複。筆者曾對此有過詳細討論，見 Meyer, “The Art of Narrative”；以及 Meyer, “‘Shu’ 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

的天尹。這樣，〈湯在啻門〉就不僅是記錄了成湯帝和伊尹之間一次想像中發對話。它體現了大臣和他們的主上之間的規範關係的重複模式，這種關係由德的存在所組織，並一次次通過演出場景下的文本朗誦被賦予生命力。

三、結論：從〈湯在啻門〉看文本演出

細緻分析發現，〈湯在啻門〉的意義建構較少發生在水平層面，即意指純粹的詞彙層面，而主要通過在文本的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的語言網絡和平行結構之間建立對應關係來建構意義。然而，這不是說意指的詞彙層面完全不重要。〈湯在啻門〉中演員名字的選擇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把場景設置在湯的統治時期，讓他詢問先帝教導的做法，顯示了同時代共同體與正統「遠古之道」分離的焦慮，由此為他們在當下重建古代理想的願望賦形，這是戰國各國佔用「書」傳統的共同做法。²⁵ 小臣的回答斷言，當下和遠古之間的差距可以通過獲取聖人昔時所用的宇宙模式彌合。

文本在演出中被激活了意義。文本不希望被挖掘出與哲學有關的術語，因為如果以這種方式被使用的話，也不會發現甚麼，反而是希望因為意義結構而被使用，這隱藏在水平層面之下，以俄羅斯套娃方式從文本的核心部分——單元二——打開。從文本嚴格的規律性構成和

25 對於這個問題，見 Dirk Meyer, *Traditions of Writings 書 (Shu)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聲音織體、語句重複、平行的句子架構、語音網絡和對數字壓倒性的關注來看，它是典型的由朗誦激活的真言（mantra）。不僅是文本，簡文的若干特徵也有利於這種用法，尤其是簡文中的記號，在大聲誦讀文本可作為輔助。每當成湯帝或小臣作出感歎時，這些記號就有規律地出現；²⁶ 它們標誌著重要的事；²⁷ 而且它們也使得作為編目一部分的單個事項有所組織，不致散亂。

最重要的也是最後一點，取決於剛才提到的特徵，文本不僅為其信息提供了可辨別的形式，還以形式表達了內容，通過演出產生了意義。它被「德」的存在所構架，體現了臣子和他們的主上之間的規範性關係的對話格式；它把成湯帝和接受者的領悟合二為一；以及，它時時通過文本演出重新激活古代的教導，加倍了成湯帝對古代教導與當下的相關性的憂慮，由此實現了伊尹的期望。

但〈湯在啻門〉在範圍更廣的戰國時期思想景觀中處於甚麼位置，以及它對我們理解那個時期有甚麼幫助呢？

第一，我們注意到最初的框架沒有增加任何思想上或語境上相關的東西。

正月己亥，湯在啻（帝）門，問於小臣

26 例如在單元一中，伊尹強調說有一些古代教導，其現實性與當下相關（有 *gwəʔ 哉 *tsɿə）。

27 例如在單元二中，成湯帝詢問各種教導的數量（幾言成人 ■■■？幾言成邦 ■■■？幾言成地 ■■■？幾言成天 ■■■？）

相反，這個框架的目的是連接文本和話語。它和「書」傳統中常見的那種背景說明有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可以在《尚書》和《逸周書》等文本中看到——這些文本在帝國時期的傳播過程中經歷了編輯和解釋上的變化——也可以通過出土文獻，比如藏於清華大學的簡牘文本，看到更廣闊的內容 / 更早期的版本。然而，〈湯在啻門〉沒有我們通常會在「書」傳統中發現的擬古元素。這可能是因為這種元素會和它真言式（*mantra-esque*）的語言產生強烈衝突，後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平白，而這種真言式的語言對其意義的建構非常關鍵。無論如何，這都表明〈湯在啻門〉在那種話語中佔據了一個相當邊緣的位置，此外，它還表明從社會政治、哲學或者其他方面來看，文本與這種話語的關聯性有多大——當然，我們並不能斷言這種連接是否成功。雖然戰國時期的文本中很少引述「書」傳統，²⁸但這樣的例子表明，這些傳統在文化上一定有很強的說服力。²⁹這一部分是因為它們被設定為記錄古代帝王和大臣的談話。《湯在啻門》也同樣試圖通過將對話設定在成湯帝和他睿智的大臣伊尹之間來利用那種權威。因此我們了解到，「書」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傳統，亞群體、甚至邊緣化的群體都會與之發生聯繫，從而發展出

28 見 David Schaberg 史嘉柏，“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 in Warring States Texts”，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eds. Kern and Meyer, 320–59。

29 對於這一點的詳細討論，見 Dirk Meyer, *Traditions of Writings 書 (Shu)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他們所需的論述。³⁰

第二，僅從迄今為止發現的戰國簡來看，戰國時期簡短的文本是常態，長文本屬於少數的例外，〈湯在啻門〉證實了這一情況。然而，傳世文本，也就是秦漢以後的編輯者所經手的文本，卻顯示出相反的局面。因此，我們必須假定隨著時間流逝，這些相當簡短的公告與其他文本相結合，並被納入更大的合集，發展成傳統流傳的那種多元文本。郭店一號墓出土的竹簡，如〈五行〉和〈性自命出〉已經暗示了這樣的發展；³¹ 那些融合了諸如敘述、演講和目錄等不同文體而成的圓融精詳、廣為流傳的文本充分證實了這一點。³²

第三，這種簡短、獨立、真言式的文本不依賴複雜的語境流傳，這記錄了那個時期文本共同體錯綜複雜的情況和文本的傳播情形。顯然，〈湯在啻門〉是在與圈內群體對話，這些共同體熟悉在表演場景中生成意義的方式。同

30 見 Dirk Meyer, *Traditions of Writings 書 (Shu)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31 見筆者在 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中關於獨立思想單元集成為複雜的《五行》的討論。艾蘭於 Sarah Allan,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也使用了那種模式。

32 今文《尚書》中的〈顧命〉是這一點的很好例子。對〈顧命〉的詳細解釋，見 Dirk Meyer,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Memory Production: Debates on Rulership as Reconstructed from ‘Gu ming’ 顧命”，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eds. Kern and Meyer, 106–45。

時，它與傳統溝通的嘗試表明，通過這樣做，它讓這些群體因為與傳統的那種聯繫而達成默許。特定的亞群體由此浮現出來，他們一方面會通過提及正統敘事（例如成湯帝和他的大臣伊尹）來構架他們的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他們生產意義的策略在很多方面與常見方法不同。

第四，雖然〈湯在啻門〉主要依賴表演產生意義，但還是有人努力去製造它的實體副本。竹子作為書寫工具當然是一種商品，因此很可能較容易獲得，但製作一篇簡文依然有相應的成本。對某些可能是邊緣的共同體來說，製造這個文本是值得做的事情。它進一步表明口承與書寫這兩大傳統並不能被分開考量，而不像某些漢學家所堅稱的，這兩者可以絕對地歧為兩途。當論及文本生產及更重要的文本使用時，我們最終必須認識到，我們看到的文本往往是口語和書面語雜交的產物。

參考書目

- Allan, Sarah.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 Baillargeon, Normand. *A Short Course in Intellectual Self-Defense*. Seven Stories Press, 2007.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ichurin, Nikita. *Kitaiskaia Grammatika (Hanwen qiming 漢文啟蒙)*. St Petersburg: v Litographii Gemiliana, 1838.
- Engelhardt, Ute. “Longevity Techniques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Daoist Handbook*, edited by Livia Kohn, 74–108. Leiden: Brill, 2000.
- Führer, Bernhard and Wolfgang Behr. “Einführende Notizen zum Lesen in China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Frühzeit”. In *Aspekte des Lesens in China in der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edited by Bernhard Führer and Wolfgang Behr. Edition Cathay, Bd. 54. Bochum: Projekt Verlag, 2005.
- Galambos, Imre. “Punctuation Marks in Medieval Chinese Manuscripts”. In *Manuscript Cultures: Mapping the Field*, edited by Jörg Quenzer, Dmitry Bondarev, and Jan-Ulrich, 342–57. Berlin: De Gruyter, 2014.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73.

- Grebnev, Yegor. “The Core Chapters of the *Yi Zhoushu*”. DPhi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
-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Harbsmeier, Christoph. *Language and Logic.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Irrefutable Conjectures. A Review of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Monumenta Serica* 64.2 (2016): 445–504.
- Harper, Donald. *Early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Wellcome Asian Medical Monographs, 1998.
- Kern, Mart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Shijing* and the *Shangshu*: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estral Sacrific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rough Han (1250 BC–220 AD)*.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143–200. Leiden: Brill, 2009.
- Krijgsman, Rens. “The Textualis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Ph.D. diss., Oxford University, 2016.
- . “An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Readership in Early China: Using and Producing the **Yong yue* 用曰 and *Yinshu* 引書 Manuscripts”. *T'oung Pao*, 104, no. 1–2 (2018): 2–65.

廖名春：〈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編連分合問題〉。《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4期，頁14–21。

Lǐ Shǒukuí 李守奎 . “ ‘Tāng zài Chì/Dí men’ dǎodù ” 湯在齋門導讀 . Paper presented at “Human Nature, Morality, and Fate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Bamboo Manuscripts, Tang chu yu Tang qiu 湯處於湯丘 , Tang zai Chi men 湯在齋門 , and in Gaozong wen yu san shou 殷高宗問于三壽 ”,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Erlangen, 10–12 May 2016.

李學勤等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Manuscript Cultures: Mapping the Field. Edited by Jörg Quenzer, Dmitry Bondarev, and Jan-Ulrich. Berlin: De Gruyter, 2014.

Meyer, Dirk.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1.

———. “The Art of Narrative and the Rhetoric of Persuasion in the ‘*Jinteng’ (Metal Bound Casket) from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 *AS/EA* 68.4 (2014): 937–68.

———. “Truth Claim with no Claim to Truth: Tex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Qiushui’ Chapter of the Zhuangzi”. 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edited by Joachim Gentz and Dirk Meyer, 297–340. Leiden: Brill, 2015

———.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Memory Production: Debates on Rulership as Reconstructed from “Gu ming” 顧命

- (Testimonial Charge)”.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 edited by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 106–45. Leiden: Brill, 2017.
- . “‘Shu’ 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 A Re-evaluation of ‘Jin teng’ and ‘Zhou Wuwang you ji’”.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224–48. Leiden: Brill, 2017.
- . *Traditions of Writings 書 (Shu)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Forthcoming.
- Nivison, David S.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96.
-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 Edited by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 Leiden: Brill, 2017.
- Richter, Matthias. “Textual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Literac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edited by Li Feng and David Branner, 206–3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 Schaberg, David.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320–59. Leiden: Brill, 2017.
- Tharsen, Jeffrey R. “Chinese Euphonics: Phonetic Patterns, Phonorhetoric and Literary Artistry in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exts”. Ph.D. diss., Chicago University, 2015.

Utzschneider, Helmut. “Ist das Drama eine universal Gattung? Erwägungen zu den ‘dramatischen’ Texten in der alt. Prophetie, der attischen Tragödie und im ägyptischen Kultspiel”. In *Gottes Vor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r literarischen Ästhetik und ästhetischen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269–90.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 vom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 9/15. Stuttgart: Kohlhammer, 2007.

———. “Is There a Universal Genre of Drama? Conjectures on the Basis of “Dramatic” Texts in Old Testament Prophecy, Attic Tragedy, and Egyptian Cult Plays”. In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Literary fi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Ancient Literatures: Options and Limits of Modern Literary Approaches in the Exegesis of Ancient Texts, Heidelberg, July 10–13, 2006*, edited by Hanna Liss and Manfred Oeming, 63–79.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2007.

張瀚墨：〈《湯在啻門》、十月懷胎與早期中國術數世界觀〉。《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4期（2017年5月），頁173–212。

趙平安：〈「地真」、「女真」與「真人」〉。《管子學刊》2015年第2期，頁104–5。